

## 一、教師專業與全球競爭力

### (一)、專業的重要性與規準內涵

分工體系的發展與分化往往依賴於專門化 (specification) 的知識體系，因而使職業間產生功能分化的現象，並提供社會運作所需的多樣化需求 (Durkheim, 1933)。上述功能分化意指功能獨特性維持職業之間的孤立性，亦即獨特性功能才足以維持個別職業的存在價值以及發展空間，並才能確保自身的獨立性以及運作的自主權，當特性職業喪失上述的獨特功能時，將會被其他職業所取代 (Luhmann, 1995)。上述功能獨特性不但使個別職業產生持續性的分化與發展之外，並且指涉與社會運作的關連性，亦即儘管個別職業的功能具有獨特性，但對社會運作的貢獻卻可能有高低不等的差異，因而產生職業階層化 (social stratification)，Davis 與 Moore (1966) 便以社會功能大小的差異為依據，將分工體系區分為專業、半專業、技術、半技術與無技術五個階層。由於專業行業對社會貢獻度最大，所以取得最高地位。Parsons (1951) 便以醫生為例來說明「專業」行業與社會運作的關連性，他認為若無醫生提供醫療服務，則許多社會大眾將承受疾病的痛苦與煎熬，並使社會產生混亂的局面。

上述專業的概念使許多研究者試圖發展出專業的規準，以區辨特定行業是否已達專業地位，或是使其他行業可藉此途徑提升其專業地位 (Carr-Saunders, 1933; Davis and Moore, 1966; Havighurst and Neugarten, 1962; Lieberman, 1964)。大體上，這些學者提出的規準包括：一組專門化的知識體系、嚴格篩選足以學習專業知識體系的人員、一定期間的教育訓練、持續不斷的在職進修、作為控制新成員的協會、此協會並能引進一套作為規範成員行為的專業倫理信條、以顧客利益為最高宗旨的非商業化行為。

### (二)、全球經濟體系的競爭力

全球化經濟體系已是無可抗拒的世界潮流，但此一體系卻導致資本、技術、生產與勞動力的自由流通現象，進而產生經濟區塊的融合，並使區域間轉趨更高的同質化，亦即彼此相互影響 (Giddens, 1990)，經由相關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經濟組織的推動，諸如 OECD、WTO 等，更加速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結合，因而使絕大部分國家捲入更為緊密的整體，致使削弱個別國家的主導權與自主權，諸如關稅，甚至教育政策的主導權 (Robertson, Bonal and Dale, 2006; Schriewer, 2003)。但是由於全球化經濟體系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，所以為取得此種利益，個別國家必須調整自身甚至放棄既有的政策。同時，要使商品得以快速流通，全球化經濟體系勢必要盡力解除貿易障礙，因而產生上述區域性或是全球性的經濟與金融組織 (姜添輝譯, 2005b; Heywood, 2003)。此種關連性顯示，在全球化經濟體下，支配世界經濟的是合作，而非單獨民族國家的政治命令或法令 (Giddens, 1990)。再者，全球化經濟體系強調自由市場的競爭力，因而前述專業的規準與意涵必須結合全球化的特性，亦即全球化競爭力。

儘管全球化經濟體系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，但是英美體系國家文化亦伴隨此一經濟體系入侵到其他國家，因而對既有的母文化產生極大衝擊，由於母文化是認同的基礎，所以全球化經濟體系將危及既有的國家認同，此種情況往往使許多國家採取在地化

(localization) 的因應策略，以藉由保護自身文化的策略來維護國民的國家認同（姜添輝譯，2005b；Schriewer，2003）。Green（2006）便指出全球化經濟體系並不盡然會壓縮國家的主導權，在維持國家認同的前提下，將會從教育著手以引進更多相關的課程與內容。

上述分析顯示，個別國家必須調整自身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，以取得可觀的經濟利益，因此全球經濟體系的影響力已超越個別國家的支配權，在尋求競爭力的前提下，個別國家已不再侷限於個別國家的內部事務，而是全球化經濟體系的競爭力，此種競爭力主要取決於人才，因而凸顯教育的重要性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先進國家特別是英美等國，將藉由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途徑輸出其文化與價值觀，因而將危及輸入國家（imported country）的文化，進而影響其國民的國家認同（姜添輝譯，2005b；Schriewer，2003）。儘管如此，Green（2006）認為，全球化經濟體系並不盡然會壓縮國家的主導權，在維持國家認同的前提下，將會從教育著手以引進更多相關的課程與內容，因為教育具有傳遞特定文化與價值觀的功能，因而為保護自身的母文化以維持國家認同，這些輸入國家將會強化公民教育的功能與內容。此種關連性再度指向教育功能的重要性，無論就國家競爭力的人才培育，或是維護母文化的國家認同，這些皆須仰賴教育發揮功能，如同先前已指出的教師專業素質將直接影響到教育成效，而教師素質又往往取決於師資培育制度。再者，顧及東西社會的文化差異，例如臺灣小學教師享有極高的社會聲望（吳文星，1983；姜添輝，2008c），相對而言，西方小學教師的社會聲望則遠不如臺灣（Etzioni，1969；Jackson，1968；Lortie，1975；Pollard，1985；Waller，1932），所以西方教育往往以教師會的集體途徑尋求更高的物質利益，因而展現較明顯的工會主義路線（Barber，1992；Gosden，1972；Ozga and Lawn，1981；Tropp，1957；姜添輝，2003，2008c）。基於此種文化差異，下文將從臺灣的歷史沿革進行回顧，以期掌握文化特性與師資培育之間的關連性：

## 二、臺灣師資教育歷史沿革

### （一）、日據時期的師資教育

臺灣的正式西式師資教育建立於日據時期，基本上，當時的教師幾乎是社會菁英的代名詞，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因素有三個，其一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，所以國小教師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；再者當時採取公費制度，由於該時期的臺灣社會仍處於農業時期，所以競爭相當激烈，因而當時的師資教育幾乎是高度篩選的菁英式模式，此種模式不僅能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於師範學校，並且公費制度也兼顧到社會公平的議題，因此日據時期的師資教育兼具卓越與公平的特性（Chiang，1996；Tsurumi，1977；吳文星，1983）。

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戰敗後，在明治二十八年（1895）三月二十三日簽定馬關條約，正式將台灣割讓給日本。於五月十日接任首任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（Akashi Motojirō）並無法順利治理臺灣，其主要因素在於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，先前並無殖民地統治的經驗。再者，存於日、台間的語言與思想隔閡，進而衍生各地頻傳的暴動事件使樺山資紀窮於應付（吳文星，1983）。此一狀況使得樺山資紀不得不採納伊澤修二（Izawa）